

要“勇立潮头”，更要“永立潮头”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谈改革者步鑫生的启示

本报记者 朱承

40年前《浙江日报》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企业家的歌》，在全国率先报道了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的改革事迹——

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大胆创牌子、闯路子，步鑫生带领濒临倒闭的小厂一跃成为当地第一个产值超千万元企业。

从此，步鑫生这一改革者的鲜活形象，大步流星地登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引发了媒体、社会的强烈关注。

当时新华社一位记者曾说，步鑫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媒体报道量仅次于雷锋的先进人物，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尽管后来海盐衬衫总厂因盲目扩张、经营不善种种原因走向没落，步鑫生也被免去厂长职务，走出他乡，但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改革者无论成功与否，总能给人启迪和力量。

40年后的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时代呼唤改革者。

如何让“企业家的歌”在新时代依然嘹亮？如何让更多改革者在“勇立潮头”之后更能“永立潮头”？本报专访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请他谈一谈改革者步鑫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记者：当年，“步鑫生热”及其随后的沉浮对您的最大触动是什么？

史晋川：1984年初，我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三年级，正在写毕业论文，听到有关步鑫生在海盐衬衫厂搞改革的报道，步鑫生那时候很有名气。

海盐衬衫总厂前身红星服装社是县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我们国家的改革已从农村农业进入到城市的工业企业领域。

记者：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看，步鑫生的哪些做法和教训值得当下借鉴？

史晋川：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步鑫生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在企业经营的管理中运用了市场

经济体制中对生产者的内在激励机制，让劳动者的工作努力与其收入分配成果更好地匹配起来。

第二，突破当时计划经济僵化的企业管理体制，引入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用市场化的方式做企业的生产经营。

回顾步鑫生之后的沉浮经历，可以发现，作为民营企业企业家，他后期在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过程当中，对于认识市场风险和处置企业经营风险方面，不够谨慎，出了问题。

这可能跟他个人的局限性有关，同时也跟当时地方政府把他树立为改革典型后，一味鼓励他更快地扩张企业有关。海盐衬衫总厂扩张太快的同时，市场效益不好，负债很多，最后破产了。

所以，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主要应该营造经营环境，而不是时不时地对企业作一番指示，去影响企业家的决策及企业的发展。

记者：当前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和当年一样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您观察到的情况如何？

史晋川：我研究民营经济40年，可以看到一些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利好因素。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来为民营企业站台，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了，货币政策方面也开始转向扩张等。

但是，仍有两个重要问题被低估了，导致目前民营企业预期不稳和信心不足。

一是疫情期间，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冲击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和负面影响。

并不是说一旦疫情缓解及防控政策放开，产业链和供应链就能马上顺利恢复。社会各方面，包括政府、企业和专家学者，对疫情后时期恢复产业链供应链的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应该说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第二，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由此带来的各主要经济体可能趋向衰退的阴影及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环境的不利影响。

美国“小院高墙”脱钩政策的逐渐累积，

欧美应对高通胀政策所带来的效应，外需的大幅度下降等，尤其对浙江省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大省而言，这种外部冲击非常明显。

我认为这是导致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国家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没有百分百显现，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遇到流动性陷阱问题，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较低。

记者：40年后我们再来重读步鑫生沉浮史，您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有什么新的思考？

史晋川：重温和学习步鑫生的改革精神，可以使得我们更加牢固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念，更加坚定我们发展民营经济的信念和信心，这在当下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学习步鑫生改革精神时，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公正客观包容地看待步鑫生这样的改革开放年代的历史人物，以及如何把这样的眼光投射到当代的标志性民营企业企业家身上。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诞生了一大批具有标志性的企业家和企业，我们对历史和现实要有一视同仁的眼光，要对他们的贡献加以充分肯定。

如何让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的勇于探索的“勇”，成为永远探索的“永”？

民营企业家的“勇”是跟他的个人见识、品格、胆识有密切关系的。步鑫生当年就具有改革的前瞻性眼光，有敢说敢做敢闯的胆识，以及勇于奉献的优秀品质。

这三种宝贵的企业家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家能否勇于突破传统旧的体制束缚，勇于去探索，做体制机制的创新。

但是，民营企业家的“永”，就不仅仅关乎企业家个人的见识胆识和品质了，而是更加需要党和政府营造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记者：您认为，当前应该怎样培育营造适合具有改革精神的企业家的成长环境？

史晋川：第一，党和政府要全面正确认识企业家的创新功能。

尽管我们非常鼓励民营企业企业家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企业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制度创新。

以平台经济为例，它们做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同时也突破了一部分原有体制，包括准入体制、监管体制。

虽然这些体制创新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政府要全面地看待企业家多方面的创新，要看到很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往往是跟体制创新结合在一起的，是不能够截然分开的。

第二，政府如何公正客观地对待及规范企业家的创新。

如果企业家的创新是合理的，就应该支持企业家的这种体制创新，去修改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如果这种创新是不合理的，那么就依法办事，但是也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用力过猛。

政府对民营企业家的创新要有包容度，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切忌动不动上纲上线，给民营企业扣帽子。

第三，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法律框架内。

政府及其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之间，既有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也有监管关系，要把这些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政企关系分清楚。

对民营企业是支持、规范，或是惩罚，政府不仅要去做对的事情，而且要用对的方式去做事情。减少政府对企业处置行为的自由度，降低随意性，这个很重要。

通过回顾和学习，我们也可以步鑫生沉浮实践中引发更多的思考。

例如，一旦社会舆论对民营企业有不利声音出现的时候，政府一定要及时地去反思，这些不利言论之所以能够出现并迅速发酵，是不是和政府做的一些事情或做事方式不妥当有关系。

反思之后，一是自我纠正，二是及时发挥主流媒体的功能，迅速拨乱反正。这样才能给企业家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让企业家敢说话和敢做事。

本报讯（记者 沈昕雨）4月27日，杭州亚运会面向全国开展的“亚运走十城”活动将在北京迎来收官，以“弘扬冬奥精神，共迎亚运盛会”为主题，串联鸟巢、水立方等经典体育地标，营造全国人民喜迎亚运的热烈氛围。

杭州，是继北京、广州之后，中国第三座举办亚运会的城市。筹备期间，杭州亚组委一直在思考，如何推动亚运宣传走出浙江，辐射全国，进而扩大杭州亚运会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力？因此，“亚运走十城”活动应运而生。

2021年5月30日，“亚运走十城”活动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启动。活动以“亚运UP”（亚运趣味跑）、“亚运MU-SIC”（亚运好声音）、“亚运TALK”（亚运宣讲）三大文化IP为载体，计划走进北京、上海、南京等10个城市，并根据不同城市的体育文化，策划符合当地特色的活动。杭州亚组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10个城市并不是随便选择的，亚奥理事会对此制定了标准，所选城市需有较高的国际化程度，或曾举办过以及正要举办大型赛事和活动。”

活动从杭州出发，首站来到上海。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内，以“杭州亚运会的机遇与挑战”为宣讲主题，松江大学城的学生们了解了杭州亚运会的丰富内涵；在上海G60科创云廊里，杭州籍歌唱家吕薇等嘉宾演唱了杭州亚运会首批优秀音乐作品，与上海当地群众共同唱响《心心相融》《相约杭州》《等你来》等歌曲；“亚运趣味跑”更是集齐了上海近百名专业“跑迷”和市民等共同参与，在奔跑中感受亚运的趣味与魅力。

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亚运走十城”活动陆续前往西安、天津、武汉、成都、厦门、南京、广州等地，并将在北京迎来最后收官。

回顾“亚运走十城”的前九站足迹，通过三大文化IP活动，从会场的娓娓叙述，到现场的氛围落地，杭州亚运会会徽“潮涌”、吉祥物“江南忆”、口号“心心相融，@未来”、核心图形“润泽”、色彩系统“淡妆浓抹”等视觉元素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特质、江南韵味及亚运美学追求，正以一种可亲近的方式走进全国人民心中。同时，亚运歌曲、亚运筹办背后的故事等，也被更多人知晓了解。

这正是举办“亚运走十城”活动的初衷。“我们希望能迎合城市交流的步伐，抢抓亚运机遇，唤起社会各界对杭州亚运会的关注与支持。”杭州亚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到后期，可以明显感觉到有更多人关注杭州亚运会。有人说“亚运期间，要去现场看比赛，再在杭州逛一逛”，有人会在参加趣味跑时边跑边喊“心心相融，@未来”的口号，还有不少人能跟着哼唱《最美的风景》等亚运歌曲。

据悉，在最后一站北京，活动将在现场发布杭州亚运会官方主题推广曲《有你有我》，助力该活动再次迎来高潮，吸引全国、亚洲和世界的关注支持，共筑“亚运同心圆”。这是杭州亚运会的期待。

台州“大陈黄鱼”地理标志品牌形象发布 “小金鳞”来了

本报椒江4月26日电（记者 陈久忍 共享联盟·椒江徐丽平）26日，台州市椒江区发布“大陈黄鱼”地理标志品牌形象“小金鳞”，以进一步加强大陈黄鱼品牌建设，为品牌升级、产业发展、生活美好赋能。

“小金鳞”名字取自海的“精灵”谐音，一身金黄色的着装，与大陈黄鱼金光闪闪的颜色相似。

椒江区是“中国东海大黄鱼之都”，目前共有大陈黄鱼养殖企业14家，年产量已达8000多吨，产值约10亿元，约占浙江省高品质大黄鱼产量产值的三分之二。“大陈黄鱼”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评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大陈黄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质押融资金额达到5亿元。

近年来，椒江区高度重视大陈黄鱼品牌建设，制定专项政策，对大陈黄鱼养殖在基地建设、科研投入、品牌建设等方面给予奖励补助，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破解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

“医疗资源要寻求均衡，这里面有不少门道。”他说，均衡不只是我们能理解的字面意思——区域之间的均衡，更重要的是考虑人和地域的因素。

一方面，分院区的设立，不只是物理性地新增一个院区这么简单。“它的床位规模、设施水平、服务能力等，要顺应区域内人口数量的变化。”董恒进说，归根结底，既然叫分院区，那就要本着方便区域内老百姓的初衷。“切不能简单地圈个地，只为增加就诊人数，或者‘虹吸’地方患者到省级大医院就医。”

董恒进曾带着学生到不少地方调研，他们发现，不少省级医院分院区瞄准的区域内，都已经有了县（区）级医院，或者社区卫生院等基础医疗资源。“优质资源和基层资源之间，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要做好协同，一个区域内大、中、小各类医疗机构，应该形成一个配合默契的生态圈。”他说，“无论如何，老百姓永远呼吁优质的医疗资源，而分院区的设立，也一定要把区域内百姓的健康、便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舟山籍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斌勇也作了视频致辞，分享创新创业的建议和想法，寄语舟山青年新乡贤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用拼搏奋斗书写无悔青春答卷。

近年来，舟山大力实施新乡贤带富工程，创新开展新乡贤“双寻找”活动，有效激活新乡贤资源、凝聚新乡贤智慧、汇集新乡贤力量。去年年初至目前，招引13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达2000人次，建立新乡贤带富实践基地13个，打造新乡贤特色工作室20家，凝聚起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流动少年宫

4月26日，2023年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流动少年宫来到中国美术学院附属小学，举办“迎亚运·传宋韵”体育嘉年华，项目包括艺术体操、击剑、武术、乒乓球等，老师们均为全国冠军，为小朋友带来专业指导。 本报记者 徐彦 摄



省级医院纷纷开出新院区方便居民看病，但专家也提出思考——

大医院布局新城区，这步棋如何下得更好

本报记者 陈宁 见习记者 林晓晖

浙大二院滨江院区已经运行满十年。这几天，这个消息让杭州市滨江区居民刘先生陷入了一阵“回忆杀”。他记得，“新院区”开建时，自己也刚住到滨江，医疗资源少，日常生活也不方便。没想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人住过来，区块内的其他设施也渐渐完善，生活变得“丰满”了。

这十年间，市域内的省级医院纷纷在城市的年轻地块布局新院区，给人们带来便利，给医院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但与此同时，有专家冷静地看到，新院区的扩张，也衍生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群众就医更方便

过去在杭州开车，司机们“最不愿去”的地方之一就是建国路一带。沿街几公里内，聚集着多家省级三甲医院，前来送医的车辆时常将这里堵得水泄不通。住在杭州市钱塘区的孟阿姨以前常常需要绕过半个城市去看病。

她曾经的烦恼，折射出了城市发展的“阵痛”——人们的生活空间不断拓展，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优质医疗资源变得不够用了。

孟阿姨所在的钱塘区，过去十多年来飞速发展，她的烦恼随之烟消云散。杭州钱塘区先后迎来了浙大邵逸夫医院和省中医院的分院区，成为区域内人们就医的首选。

类似例子还不少。浙大二院滨江院区成立后不久，浙大儿院也在滨江设立分院区；还有，在互联网企业聚集的杭州西部区块，浙

大一院余杭院区之和之江院区的落地，让不少互联网人才在这里安心“驻扎”……

“不论在哪个城市，医疗资源的布局，总是和人生存发展的轨迹紧密关联。”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南通大学长三角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何建华说。上海早在2009年，就开始从政府层面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一院多区的建设模式已经实践并趋向成熟。

何建华说，城市还在越变越大，分院区的设置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难题，“但至少解了不少百姓的燃眉之急。”他认为，“分”的模式、形态有很多种，但是本质没有改变，最终目的在于提高优质医疗的及性，最终的落脚点是分级诊疗的区域分开，为了更好地服务老百姓。

医院获得成长新空间

在省中医院钱塘院区急救创伤中心主任徐华的记忆里，离开位于主城区的老院区后，自己也获得了“二次生长”的机会。

省中医院湖滨院区在杭州的闹市区，受限于空间等因素，给整个急诊学科发展带来不少制约。“特别是群发伤的抢救、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对设施设备、场地有不少要求。”他说，随着医院在钱塘区域设立分院区，场地、设施因素得到改善，医院急诊学科的综合救治能力得到了有效拓展和延伸，学科的发展也有了新空间。

“地方不够大，医院的发展也存在空间瓶颈。”浙大二院党委副书记马岳峰直言不讳，想要扩容病区为更多患者服务，同时，还要腾

出空间打造更前沿的医学研究实验室，不能只在原来的“一亩三分地”里踏步。

为了印证徐华和马岳峰的说法，记者来到了浙大二院滨江院区实地探访。

在急诊检验处，抬头就能看到贯通整个院区的物流轨道，轨道上血液标本、药品物资正在有序、高效地传送；药房内，自助发药机内的机械臂快速运行，患者不用离开诊间，药品就送到手里。“这些细节，令不少患者对滨江院区有着很高的评价。”浙大二院医务部主任潘胜东说，在同质化管理的基础上，新院区拥有更大的探索空间。

比如滨江院区的单元化治疗，把相近科室的医生集中在一起，方便患者就近就诊。如果一位头痛患者先挂了神经内科的号子，经医生初步询问，认为他应该去看神经外科，他就可以立即转诊，走上几步，去相同单元的神经外科，不用重复挂号。

可以说，新院区不仅仅是一家“子医院”，在延续重点学科优势的基础上错位发展，也成为新事物的“试验田”。

优质医疗资源如何更均衡

十多年前，浙江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恒进教授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的三墩镇，随着几家省级医院分院区在此落地，他见证了附近医疗资源从无到有，越来越好。

不过，在卫生政策领域深耕多年的他，依然颇为冷静地看待省级医院的快速扩张。就在4月13日，国家卫健委召开了“贯



小金鳞